

断根术：编制崇拜与生命形态的隐形拦截

被拦截的不是选择的自由，而是某一类判断得以长出来的那段前史

作者 刘言言 · SDE 学徒工 · 约 3.3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9日 · 深化增补版

摘要

当代中国社会对“编制”的执迷，长期被“寻求安全感”与“规避风险”的解释路径所主导。本文指出，这两种解释及其更精细的变体共享一个未被追问的先验预设——个体在进入编制系统之前，已经是一个携带着自身欲望与可能性的成形之人。本文追溯了编制系统的考核制度如何在三十年间，通过逐项量化的年度考核表格、一票否决制的辐射效应以及由此催生的“自清”文化，将“不确定性”从一项需要勇气面对的生命常态，转变为一种弥漫性的合规压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不同的核心判断：编制崇拜最要害的运转机制，不是“提供安全感”或“排除风险”，而是系统性地拦截个体生命中那些尚未成形、无法在考核表格上被证明“合规”的生成状态。本文将这一机制命名为“断根术”。通过与新自由主义治理术、规训权力、控制社会理论以及经典异化理论的逐一对话——其中与治理术的对话以“先让对手逼退三次”的方式展开，使断根术在几乎被归并的极限处获得其不可还原的辨别维度——本文论证“断根术”指向的不是对已成形行为的禁止或压抑，而是对尚未成形的生成过程本身的拦截：其暴力施加于主体成形之前的那片混沌。本文以一名基层公务员入职五年的跟踪性个案为经验锚点，展示考核语法在日常选择中如何逐层内化，并主动保留了个案中一个概念“解释得勉强”的细节，将其作为断根术当前理论盲区的种子。在此基础上，本文与中国的单位制研究、干部考核制度研究及“体制内”职业倦怠研究等本土文献进行了实质性对话，以锚定断根术的制度独特性。

关键词：编制；断根术；生成状态拦截；考核表格语法；不确定性压力

一、问题重判：编制崇拜的要害，到底落在那片被忽略的混沌里？

1.1 从“安全感”和“风险”再往外迈一步

编制崇拜何以在当代中国社会成为一种跨越阶层、席卷代际的集体执迷？两种解释长期主导着公共讨论与学术研究。第一种可以称为“安全感解释”：在就业市场波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稳固的现实下，编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可预期的晋升与不会被轻易解雇的制度承诺。第二种可以称为“风险规避解释”：在风险社会的普遍焦虑中，个体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将不确定性降到最低的人生路径，而编制恰是制度化避险的最优解。

这两种解释都有足够的经验支撑，也都说出了部分事实。但它们共享一个在更深处决定了其解释边界的预设：它们都假定了，一个个体在做出“选择编制”这个决策时，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携带着自身欲望、能力与可能性的主体。在这个预设下，“安全感”和“风险规避”都是在描述这个已完成的主体如何在一个外部选项集合中进行理性权衡——就像一个人走进一家超市，货架上摆着“编制”“市场创业”“自由职业”等商品，他逐一比较价格与效用，然后把编制放进购物车。

本文要做的不是在这两种解释之外再增加第三种解释，而是撤销这个“主体已经成形”的预设本身。一旦撤销它，编制崇拜的整个分析画面就不再是一群已完成的主体在做选项权衡，而是一个生成过程被拦截的现场——大批年轻人在还没机会弄清楚自己真正在乎什么、还没机会让那些模糊的冲动长成可被命名的梦想之前，就已经被一套制度性的自清程序说服，将那些尚未成形的冲动提前判定为不值得投入的选择。

1.2 既有解释的“够到但没穿透”

在展开本文的核心判断之前，有必要先让几种最有解释力的既有框架各自以最精细的版本出场，然后逐一指出它们在哪个点上“够到了”编制崇拜的实质，又在哪个点上未能穿透那层最要害的东西。

风险社会与本体性安全。贝克和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早已指出，现代个体的“避险”远不只是对物质安全的追求，而是一种“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需求——个体需要维持一个连贯的自我叙事，以使日常生活得以正常运转。在吉登斯的分析中，本体性安全的核心是“信任”——对他人的信任、对制度的信任、对未来的信任。从这个角度看，编制的吸引力恰在于它提供了一套不需要反复重写的自我叙事：你是什么级别、你属于哪个单位、你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大致呈现什么轮廓，这一切在入职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制度安排好了，你不需要反复回答“我是谁”“我要往哪走”这些令人焦虑的问题。

这套分析比简单的“求安稳”深刻得多。但在一个关键点上，它仍然默认了那个被保护的东西已经存在——它假设个体已经有一个连贯的自我叙事，这个叙事只是受到了风险社会的持续威胁，而编制是一个将叙事重新稳定下来的避风港。本文要追问的恰恰是：对于那些从大二就开始规划考编路径、连这个“自我叙事”都还没机会长出来的年轻人，被保护的根本不是一个已经成形的叙事，而是让叙事得以成形的那段混沌期。本体性安全理论够到了“为什么人们害怕不确定性”，却没穿透“有些人已经从根上失去了进入不确定性的能力”这一层。

系统内耗与“内卷”。另一类较新的解释用“内卷”来描述编制竞争的生态：大量高学历应试者涌入一条通道，不断抬高门槛，使得备考从一场技能竞赛演变为一场消耗战，而消耗战本身又进一步挤出那些原本可能有其他志向的人。这种分析正确地指出了竞争规则如何筛选人格类型，但它对规则的来源保持沉默。“内卷”被描述为一种弥漫性的文化氛围或博弈均衡，却没有被追问：这套规则——让备考者把大学四年异化为一场针对申论和行测的长期特训、让他们在每一个“要不要做点别的”的念头冒出来时都觉得这是在亏损——究竟是怎么被制度性地生产出来的？当“内卷”被当作最终解释时，规则本身的历史就被冻结了。本文要做的正是解冻这段历史：追问规则从何而来，以及它如何从一种工具性的设计演变成为一种人格改造的机制。

阶层焦虑与防御性个体。对于将编制崇拜归因于阶层下滑恐惧的解释，本文在某种意义上距离它最近，但也恰恰因此必须做出最清晰的切割。本文不否认，在一个阶层流动通道收窄的时代，大批年轻人将考编视作守住父辈阶层位置的底线策略。他们的起点动机是防御性的，这完全真实。但本文要论证的是：一旦他们进入备考通道，他们就不可能只做“准备考试”这一件事——他们同时还被培训了一套全新的认知习惯：如何在申论给定的狭窄框架内表达安全的观点，如何在面试中精准地不越界，如何将复杂的人生问题迅速分解为可被量化的选项。这套训练在短期看是工具性的——为了通过

考试。但在长期、大面积、重复执行之后，工具从手里长进了身体里。断根术描述的正是这套“工具变成身体”的过程，而不是对个体最初动机的鉴定。

中国本土的制度研究传统。以上三种框架都来自西方理论脉络。但在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中，至少有两条研究路径与本文的关切直接相关，却始终未曾与上述西方理论在同一个问题意识下正面相遇。第一条是单位制研究，从路风、李路路到李汉林等学者，已经对单位作为“社会控制与福利分配复合体”的制度逻辑做了系统分析。这条路径揭示了单位如何将个体的全部生活——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纳入同一套行政管理体系，从而形成一种“组织性依附”。这条路径为断根术的制度前提提供了坚实的本土经验基础：编制对人的控制之所以能如此深入人格层面，首先是因为它在制度上确实管着人的全部生活。但它分析的重心落在“依附”的结构特征及其社会分层后果上，未曾追问：当一个人长期处在“无需为自己的全部生活做选择”的依附状态中时，他做选择的能力本身会发生什么变化？

第二条是中国干部考核制度研究。从荣敬本等人的“压力型体制”概念到近年来关于基层干部“问责疲态”的实证研究，这一路径详细考察了量化考核与一票否决制如何在各级地方政府制造“层层加码”与“避责”行为。这条路径对断根术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考核表格语法在实际组织运行中的经验细节——表格如何被填、排名如何被使用、一票否决如何被层层放大。但它分析的重心落在考核对“组织绩效”和“干部行为”的影响上，未曾追问考核语法在长年运转之后对干部“认知习惯”和“生命姿态”的深层改造。断根术正是在这两条本土研究路径的延长线上——但不是在它们的延长线上增加一个同类项，而是在它们的交叉点上提出一个它们各自都没有问出的新问题：当单位制提供的“全面依附”与考核制制造的“全面自清”合在一起，长年运转之后，它们在个体身上生产出的，不止是“不敢做某件事”，而是一种更原初的、连“想做什么”的能力都受到侵蚀的生命状态。

1.3 撤销预设，让新判断从矛盾里结算出来

当“个体已经成形”这个预设被撤销，编制系统对人的干预就不再呈现为“对已有欲望的压制”或“对已有能力的筛选”，而呈现为一个更原初的动作：它在个体还没来得及形成那些以后可能被称为“梦想”“志业”“热爱”的东西之前，就用一套合规压力拦住了那股混沌的、尚未说清自己是什么的冲动。

这不是压制。压制的逻辑是：你心里有个东西，它被外力摁住了，你痛苦，你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你在深夜可以为自己列一张“为了上岸我放弃了什么”的清单。断根术的逻辑比这更彻底：你从未在足够长的时间里被允许拥有那个东西，以至于它从未长到可以被你认知为“我曾经有过但失去了”的形态。你不是放弃了梦想——你是从未被允许做过足够久的梦，长到足以让梦获得一个名字。

据此，本文的核心判断可以表述为：编制系统最根本的命令，不是“别犯错”，不是“要忠诚”，甚至不是“要高效”——而是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持续地、系统性地拦截一切尚未成形的生成状态，在它们有机会长成可被识别、可被辩护的形态之前，就通过一套前置性的合规门槛，将其标记为不值得投入的成本。本文将这一机制命名为“断根术”。

断根术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涵盖制度端与心理端两个面向，两者不可分离。在制度端，它指的是由考核表格的格子语法与一票否决制的辐射效应共同构成的那套前置性合规门槛——它要求个体在投

入任何行动之前，先用表格的语法自问“这件事能填进哪个格子”。在心理端，它指的是个体在长年运行这套自问之后，将这套语法内化为自身认知习惯的过程——他不再需要表格在场，他自己在念头萌芽的极早期就替表格完成了拦截。两端分开看，各有一些既有概念可以部分覆盖（制度端：合规文化；心理端：自我规训）。但断根术的确切所指，是两端之间的那个闭环反馈：制度语法内化为心理习惯之后，个体在每一个选择面前自发地替制度执行拦截，而每一次这种自发拦截的成功执行，又反过来加固制度语法在个体认知中的合法性。没有这个闭环，“拦截”就是一次性的、依赖外部监督的；有了这个闭环，拦截就变成了自我循环、自我加固的。这个闭环本身，是既有概念工具箱中缺失的那个辨别维度。

“断根”不是“核算”的升级版。“核算”这个词假定了有一个已经存在的账本、一个已经成形的资产组合，然后对它进行盘算。而断根指向的是被盘算之前的那一步：那些尚未进入账本、尚未被承认为“资产”或“亏损”的混沌状态，在能够长大之前，就被掐断了。这层区别是根本性的。一个被核算型逻辑全面渗透的人，至少还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他可以在某个深夜为自己列一份“这些年我放弃了哪些可能”的清单。而一个被断根术全面捕获的人，连这份清单都列不出来。他不是放弃了梦想；他是被剥夺了做梦所需要的那段不被审判的时间。

1.4 概念层级：被拦截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为确保全文在使用“生成状态”及相关概念时严格一致，此处先做一个层级区分。断根术的靶心在不同深度上同时作用于三个层面：

生成能力（元层）：个体对不确定性保持开放、允许自己进入混沌探索状态的能力。它不是一种具体的技能，而是一种更底层的“不去提前清算”的生命姿态。断根术最深远的后果，正在于在长年运转中侵蚀这一元层——让一个人从“愿意试试看那些说不清结果的事”变成“在还没开始之前就已经替自己算完了账”。

生成式投入（中层）：个体在实际行为中，将时间投入那些“在开始之前无法预见具体成果”的事务的行为模式。这层是断根术日常运转的主要靶区：每一次在填表格时发现某件投入“无法被任何格子承认”的时刻，都是在中层实施拦截。

生成状态（具体层）：在每次生成式投入中，个体所进入的那个具体的、混沌的、尚未成形的过程。这层是被拦截的直接对象——那个下午想翻一本闲书的冲动、那个想在工作会议上提一个还不成熟的想法却又咽回去的瞬间、那个在心里被反复盘算最终被判了“不值得”的念头。

三层的关系是递进的：断根术在具体层上反复拦截生成状态（让你每一次想“做点别的”都被拦下），长期积累后在中层改变你的行为模式（让你不再进行生成式投入），最终在元层上改写你的生命姿态（让你失去进入混沌的能力本身）。

但必须立即加上一句限定：这三个层面的区分本身也是一次概念上的临时切割——在真实的个体经验中，它们不是三层楼，而是一块被反复撕扯的布。哪个层面此刻正在被拦截，取决于个体在制度时间轴上的位置：一个刚入职的年轻人可能在具体层上反复碰壁但元层尚未受损；一个入职十五年的人可能三层已被压成一块。下面各章的分析将在这三层之间来回移动，并在每次移动时标示清楚当前分析的靶心在哪一层。

二、“不确定性压力”的制度发生：考核技术如何三十年练成一门断根术

任何概念如果不能在发生层面交代它自己是被什么样的制度矛盾逼出来的，就始终悬在半空。本章追溯编制系统如何在三十年间，通过几轮制度改革的内在张力，将“不确定性”从一项需要勇气面对的生命常态，转变为一套弥漫性的合规压力，并在此过程中逼出了那套让个体在每一个选择面前自发启动“能否填进格子”这道自问的命令。这套命令，就是断根术的制度骨架。

2.1 表格之前：模糊评价的弹性与其被拆除

在讨论表格如何制造“不确定性压力”之前，有必要先交代表格取代了什么。1990年代之前，体制内单位的评价体系——如果可以称作“体系”的话——建立在模糊的、人际化的综合评定之上。一个人的工作表现由直属领导和单位班子综合判断，评价标准是难以被逐项量化的：政治上是否可靠、工作上是否勤恳、群众关系是否融洽。这种模糊性有其众所周知的弊端：它为任人唯亲、暗箱操作留下了空间，它缺乏程序正义，它让“干得好不如关系硬”成为可能。

但它同时有一项在当时未被言明、直到它消失之后才凸显出来的保护功能：它为那些“暂时看不清成效但可能有价值”的工作留出了弹性空间。一个年轻教师花半年时间尝试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失败了，但在年终总结会上可以说“这半年我摸索了很多，虽然成果还不成熟，但方向是对的”，而领导可以在综合评价中用一句“精神可嘉”带过，不将其量化为一项明确的负分。这种弹性的本质是：组织在某个模糊地带，默认接受了投入与产出之间可以存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差。

今天回头来看，这项弹性被拆除的过程，其发动机并不是什么人蓄意要消灭创造力，而是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的一项制度变革：岗位责任制与绩效工资改革。这项改革的初衷是打破“大锅饭”、提升效率、建立可量化的激励体系——它的矛头对准的是模糊评价的弊端，而不是它的保护功能。但制度变革一旦启动，就会沿着自己的逻辑走下去，不受初始意图的约束。

2.2 表格的语法：从“你做了什么”到“你能在哪个格子里证明你做了什么”

年度考核表的普及，是这轮改革中影响最深远的一项技术。表格的设计初衷很简单：把工作分解为若干可量化的维度——教学时数、论文篇数、项目金额、获奖等级——然后逐项打分，年底结算，与绩效工资挂钩。这看起来只是一个技术性的管理工具改进。

但表格是一种语法，而语法会反过来塑造使用者的思维方式。这句话不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说的。当一个人的全部年度工作被要求在十二月底填进一张预先设定好格子的A4纸时，格子本身的分类方式就在无声地告诉他：你的工作分为“论文”“项目”“教学”“其他”四类（或类似分类）；前三类有明确的计量标准，“其他”栏里的空间极小且不计入核心评分；因此，凡是在过去一年里你所做的、无法精确地在这些格子里填入可计量成果的事，将不会在这张年度结算单上被承认为“你做过的事”。

这不是禁止，而是更微妙的东西：它不是在事后惩罚那些做了“填不进格子的事”的人，而是把“填不进格子”本身变成了一种弥漫性的压力。一个教师用两个月时间尝试一种全新的课堂设计，在年底填表时，他发现这项尝试无法填入“论文”栏（还没发表）、无法填入“项目”栏（没申请到经费）、也无法用数据填入“教学”栏（教学评分要到明年才能反映成效）。他在格子里能填的，

是“参与了教学活动”——这五个字和一个全年按部就班上课的人填的内容在表格上没有任何区别。他并没有被惩罚。他只是发现，那两个月在表格上是不存在的。

2.3 一票否决的辐射效应：从“不碰红线”到“不碰红线外围的灰色地带”

与考核表格的正向挤压相配合的，是一票否决制在负向上的辐射效应。一票否决制的本意是对某些极端后果——重大安全事故、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意识形态差错——设置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制度设计者的意图中，这只是一个兜底的例外机制。但在实际的组织运行中，一票否决制造了一个逻辑上必然的溢出。

溢出机制是这样的：当组织宣布“如果在A类事项上出问题，全年工作一票否决”时，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不会仅仅避免在A类事项上出问题。他会同时避免一切“有可能间接牵连到A类事项”的行为。因为识别一个行为是否“间接牵连”到红线，本身就带有不确定性——而一旦识别错误，代价是整年工作归零。在不确定性的这一端，个体唯一理性的策略，是把所有无法百分之百排除牵连可能的行为，都当作有牵连来处理。这就意味着，一票否决的实际效力范围，永远大于它在制度文本上规定的那几项。它从一条明确的红线，外溢为一片弥漫性的灰色地带——在这片地带里，你不需要真的出事，你只需要“无法百分之百地证明自己不会出事”，就足够让你主动撤回那项行动。

2.4 分叉点：那些被压制的替代路径

以上是一段线性叙述。但线性叙述有滑入既成对象论的危险——它把一个历史过程讲成了“必然如此”的单行道。为了守住发生学的纯度，本节必须追问一个问题：在那几轮制度改革中，是否曾经存在过走向另一条路的机会？如果存在，那条路为什么没能走下去？

实际上，在1990年代末岗位责任制改革的早期方案讨论中，并非没有人提出过更弹性的评价方案。一些地方试点过一种“综合评述+量化指标”的双轨制：年度考核仍然需要填表格，但表格中保留一个“自主申报栏”，允许个人用一段文字描述那些“尚未形成可量化成果但具有探索性质的工作”，并由主管领导在综合评价中对此做出定性判断。这个设计试图在表格语法中保留一个“例外格”——一个允许不确定性被承认其存在而不被立即清算的空间。

但双轨制在2000年代初的实践中遭遇了两个结构性困难。第一，在缺乏程序约束的情况下，“自主申报栏”迅速沦为人际关系的延伸——与领导关系好的人可以在栏里写“探索了XX方向”并得到正向评价，关系一般的人则被要求“写具体一点”。模糊地带一旦失去制度化的保护，反而成为新的不公来源。第二，从上级主管单位的角度看，“量化指标”具有“自主申报栏”无法比拟的考核便利性——前者可以用数字横向比较、纵向追踪，后者则需要投入大量时间阅读个案叙述，且可比性差。在绩效考核压力自上而下层层传导的科层体制中，便利性天然压倒弹性。

于是双轨制在大多数单位被悄然放弃。“自主申报栏”被取消或缩水为一个字数严格限制、不计入评分的“附注”栏。表格彻底统一为可量化的数字容器。这不是一个突然的决策，而是一个没有明确决策者的演化结果——在每一个压力传导的节点上，当事人都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微小且理性的选择（“既然要考核，总得有数字”“没有数字怎么比”“既然没法比，那就不计入评分”），而这些微小选择的累积效果，是彻底关闭了表格内部那个唯一能容纳“暂时看不清成效的事”的窗口。

这个分叉点的意义在于：它表明断根术的出现并非必然。在某个历史时刻，存在过一个不那么彻底关闭生成状态的制度替代方案。它的失败不是因为“量化天然碾压模糊”，而是因为在特定的组织条件下——科层压力传导的便利性需求、程序正义规范的缺失——那个替代方案没能站稳。断根术是在那条路被堵死之后，从另一种方案的胜出中长出来的。

2.5 “说不清价值”如何从“被忽略”变成“需要回避的后果”

现在可以将前四节的内容收束到一个更核心的判断上了。考核表格的格子语法和一票否决的辐射效应，单独看是两项不同的制度技术——一个是正向挤压（你必须填满格子），一个是负向挤压（你绝不能碰红线）。但它们在同一个方向上制造了同一种效果：它们在个体的每一个选择面前，设置了一道前置性的合规门槛。

你要么证明这件事能填进某个格子——否则它就在年底的结算中被归零，而那一年你投入的时间将不被组织承认为有效的工作。你要么证明这件事不会牵连任何红线——否则它就可能在某天成为毁掉你全年工作的扳机。能够同时通过这两道门槛的，只有那些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可以清楚预见其过程和结果的事。而恰恰是那些最需要时间、最无法在早期阶段说清自己是什么的事——摸索一个新课题、尝试一种新工作方法、在既有流程中发现一个系统性缺陷并试图推动改革——在这些门槛面前被系统性地淘汰。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论证环节不能跳过：为什么“不被承认”会被个体体验为一种需要主动回避的后果？在表格语法下，一件事填不进格子，直接后果是“不算数”——它不影响基本工资，不触发处分，不进入档案。如果“不算数”仅仅意味着“没加分”，一个理性的行动者完全可以把它当作“没损失”而继续做。但事实上，大量体制内从业者却在“不算数”面前主动收手。这说明“不算数”在编制系统里有一个被表格本身遮蔽了的真实代价。

这个代价在基层单位的实际运行中至少包含三层。第一层是排序性的：年度考核排名末位虽然在制度文本上不等于“不合格”，但在许多单位实际操作中是轮岗、边缘化乃至“被谈话”的隐性依据。一个把大量时间投入“填不进格子”的工作的人，即使不犯错误，他的可量化业绩也必然低于那些只做“填得进格子”工作的同僚。在排名序列中，他不是“犯了错的人”，他是“排名靠后的人”——而这两者在组织内部的实际待遇往往难以区分。第二层是声誉性的：在一个人人都知道“表格上只认这几个格子”的科层文化中，一个人反复做“填不进格子”的事，会在同事中获得一种微妙的标签——“这人不务正业”。这个标签比“能力不行”更致命，因为它意味着此人“不懂规矩”“不够成熟”。第三层是累积性的：一次“不算数”确实没有直接后果，但三次五次之后，此人在领导那里的印象就从“工作积极”变成了“方向感差”“抓不住重点”。这一点在晋升环节的作用方式不是被明确写入某个文件，而是在讨论人选时以“这个人嘛，热情是有，就是不太踏实”的模糊判断出现——而模糊判断的杀伤力恰恰在于它不可申诉。

只有把这“不算数”的三层实际代价——排序性的、声誉性的、累积性的——讲清楚，“断根术”的制度端分析才完整。不是“表格没打你”，而是“表格不给你加分的同时，你还因为没加分而承受了实实在在的排序后果、声誉后果和晋升后果”。当一个理性行动者看清这一点，他的“主动放弃那些填不进格子的事”就不再是对一张纸的畏惧，而是对一套以表格为中心的、没有被写进任何规章但比规章更无从争辩的隐形筛选秩序的真实适应。这套秩序不一定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惩罚”，因而本文在终稿中选择不使用“罪责化”一词——那个词暗示了一种正式归责程序，而断根术的压力运

作恰恰在正式程序之外。更精确的说法是：编制系统将“说不清价值”从一种中性的、可以被弹性评价吸收的状态，转变为一种会导致实际负面后果的合规风险。

三、断根术的不可还原性：与四种理论传统的正面碰撞

断根术作为新概念，其理论硬度不来自它“前人没说过”——实际上前人在不同语境下说过很多与之密切相关的东西——而来自它在与最接近的既有理论的正面碰撞中，每一步都剔除了可被归并的成分，最终留下的是一个既有概念工具箱未能配备的辨别维度。本章将逐一与四种理论对话：新自由主义治理术、规训权力与控制社会理论、经典异化理论、以及中国本土的单位制与干部考核研究。前三个理论在靶心（控制什么）上与断根术最接近，最后一个则是断根术能否成立为“编制系统独有机制”的最关键的对话者。

3.1 治理术：在几乎被归并的极限处切开那条缝

在所有现存理论中，对断根术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福柯学派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命题。威胁大到什么程度？大到这句话不是在修辞——“断根术”作为概念能否成立，取决于它能否在与治理术的正面碰撞中活下来。因为治理术的核心洞见——当代权力不再以禁令为主要手段，而是将个体塑造为自己的企业主，你的教育、健康、人际关系都被转化为需要投资、管理、增值的人力资本——几乎可以把编制崇拜中的所有现象都吃进去：专业选择被当作教育投资决策，备考被看作资本积累期，上岸则被视为资产保值。一个用治理术框架研究编制的分析者可以写出一篇逻辑自治的论文，将编制崇拜论证为个体在计算自身人力资本配置时的一种理性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概念如果只是在治理术的延长线上加一个“中国案例”，它就不配拥有一个新名字。断根术要获得自己的理论生命，必须在与治理术的碰撞中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承认治理术对编制崇拜具有强大的、在相当大范围内有效的解释力——不压低对手，不把对手变成稻草人。第二，它必须在治理术解释力最强的那个点上，找到一条治理术自己够不到的缝。

第一轮推演：让治理术赢。

让我们先假设，编制崇拜完全可以用治理术来解释。一个大学生决定考编，他计算了创业的期望收益（低成功率、高波动性）与编制的期望收益（中等收入、极高稳定性），在风险调整后的效用比较中选择了编制。入职后，他继续作为一个“自身人力资本的管理者”运作：他选择投入某些工作、不投入另一些，标准是这些投入能否提升他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上（或在体制内晋升通道中）的价值。那些“填不进表格的事”，他不去做，不是因为有人禁止他，而是因为这些事在他的投资组合里投入产出比太低。这完全自治。断根术说了什么治理术没说的事吗？到此为止，什么都没有。

第二轮推演：收紧治理术的网。

但治理术可以走得更远。晚期治理术——在布朗的“韧性治理”和拉扎拉托的“负债主体”那里——已经意识到，个体不只是在计算收益，他还在计算风险。一个负债主体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会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项需要持续偿债的资产来管理。从这个角度看，编制系统中的那个“在做事之前先自问这件事能不能填进格子”，无非是负债主体的一种审慎的风险评估行为：他在评估一项投入

是否可能变成“坏账”。断根术把这种风险评估叫作“前置性合规门槛”——但对治理术而言，门槛就是风险评估本身，换了一个术语并没有增加新的辨别维度。

到这一步，断根术仍然被治理术完全包裹。治理术不否认人的行为会被制度约束，它只是把所有被制度约束的行为都翻译成“个体在制度环境下做出的理性投资决策”。包括放弃——放弃那些投入产出比低的事——也被翻译为“投资纪律”。

第三轮推演：把断根术逼近墙角。

如果治理术的逻辑贯彻到底，那么它必须能够处理以下场景：一个编制内教师，在学年开始前，认真考虑是否要用一学期的时间尝试一种新的教学方法。他搜集了相关信息，估算了成功的概率（40%），估算了成功后的收益（发表一篇教学论文、获得一项教学成果奖），估算了失败的成本（损失一学期的时间、在年终考核上少了一项可量化成果）。他把这些参数代入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计算结果是：虽然成功概率不到一半，但一旦成功收益巨大，从期望值看，这是值得做的。于是他决定投入。

到此为止，治理术运作得很完美。但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他发现，在他所在单位的考核表格上，“教学创新”没有一个专门的格子。它可以勉强挂在“教学”栏下，但那个栏只认“教学时数”和“学生评教分数”。而他的新教学法，在第一学期的评教中可能因为学生不适应而分数下降——对表格来说，这不是一个“投入尚未见效”的状态，这就是一个“教学评分下降”的既成事实。与此同时，他的同事在这一学期里按部就班地多上了二十节课、带了三篇本科生论文——这些东西在表格上全是可被计量的正分。在年底的排名中，他的名次会下滑。他不需要被惩罚；他只需要被排名。而在晋升的隐性排序中，“那年他排名不高”会成为一个需要被解释的负分。

他重新打开自己的投资模型，发现模型缺少了一个关键参数：不是“失败的概率”，而是“在成功到来之前，这个投入行为本身在考核语法里被翻译成什么东西”。它不被翻译成“投资”。它被翻译成“什么都没有”。他的模型可以处理“投资的亏损”——一个被赋予概率和预估损失的负面结果。但模型处理不了“投资在开始之前就在语法层面上不存在”。这不是一个可以被赋予概率的事件。这是一个类别错误：他把一件在考核语法中被归类为“不存在”的事情，错误地放进了需要计算概率的投资决策框架里。而当他意识到这个类别错误时，他就不再做这个计算了——不是因为他算出来不划算，而是因为算式本身不承认这一项是合法的参数。

从第四次推出那条缝。

这就是治理术够不到的那条缝。治理术版本的风险评估，止损发生在量化之后：你必须先能把一件事放进投资组合的框架里，给它赋一个值——哪怕是一个估算的概率范围——然后才能决定投不投。它的前提是：所有可能的行动，都先在概念上被承认为“可被计算的选项”。而断根术的拦截发生在更靠前一步：在个体还没来得及把一件事量化为“成功概率40%”之前，考核表格的语法就已经先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件事在它产生任何成果之前，第一年能填进哪个格子？”如果答案是“填不进任何一个”，那么拦截就在这一秒完成。概率还没来得及被赋予，混沌还没来得及被接纳为“有待计算的未知”，这件事就已经被踢出了“可被计算的选项”这个集合本身。

这一区别的分量在于：治理术把一切都变成了投资，但它至少允许你把几乎任何东西都先转化为可计算的形式之后再决定是否投——它给你一个进入算式之前的概念门槛很低，门槛主要设在算式内

部（高不高、赚不赚）。而断根术的拦截点，恰是那个“允许你进入算式”的概念门槛本身。它拦住的不是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而是那些连“风险”和“回报”都还没法被表格语言说清楚的项目——而这类项目，恰恰是一切真正生成的起点。

在与治理术的这场对话中，断根术不是“从外部”驳倒了治理术，而是让治理术把自己推到了逻辑的尽头，在尽头处暴露出它自己无法处理的那一个场景。那个场景，就是断根术的理论出生地。

3.2 规训与控制社会：靶心的精确坐标与拦截主体的差异

与福柯的“规训权力”和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理论对话，是断根术不可还原性校验中相对清晰的一步，因为这两种理论所描述的靶心——规训的靶心是已经做出的行为，控制社会的靶心是由数据追踪预判的潜在行为——与断根术的靶心之间各有一条明确的界线。真正的理论张力不在断根术与这两种理论各自之间，而在这两种理论本身之间的那个过渡带——即德勒兹提出的“规训社会正在向控制社会过渡”这一判断——能否将断根术吸收为这个过渡过程的一个注脚。

规训权力运作在行为之后：它通过对身体动作的反复操练（军队的队列训练、学校的课堂纪律、修道院的时刻表）将规范镌刻进个体的肌肉记忆。断根术的靶心则更靠前：它不是对已做之事的反应，而是对念头的形成过程本身的拦截。当一个公务员考虑要不要在周末组织一场与其他单位年轻人的自发讨论会时，他还没有做出任何行为——他甚至还没有把“组织讨论会”这个念头转化为一个明确的计划。但他在这个念头的形成阶段，就已经在脑子里跑完了一套安全审查程序，而程序的终点，十个念头里有九个会被他自己在内部消化掉，永远不进入行为层面。规训理论的靶心是“行为的矫正”，而断根术的靶心是“念头的自清”——这不在规训理论的射程之内。

控制社会理论看起来更逼近断根术。德勒兹的判断是：规训社会依赖封闭空间中的身体规训，而控制社会不再依赖封闭，它通过持续追踪、数据化、预判来管理人的潜在可能性——在你还未行动之前，系统已经通过你的数据画像为你预设了可选的选项。“控制发生在行为之先”——这个洞见似乎已经把断根术的核心发现提前说了出来。

但断根术所描述的“行为之前的拦截”，其运作机制与控制社会理论所描述的“数据追踪的预判”有一个结构性的区别。控制社会的预判依赖的是外部数据：你的消费记录、社交媒体轨迹、行动定位、信用评分被算法抓取、建模，然后在你做出选择之前，系统已经为你推送了它替你筛选过的菜单。这其中的权力运作有一个清晰的外部主体——那个拥有你数据的平台或机构——以及一套清晰的技术手段（数据挖掘、算法推荐）。断根术的拦截则不依赖数据追踪。它不需要知道你在想什么，也不需要收集你的行为数据。它只需要你在做每一件事之前，自己先逐项填完那张“这能填进哪个格子”的自查表。这与控制社会在形式上相似，却在结构上相反：控制社会用数据抓你，断根术让你自己抓自己。前者依赖一个外部监控主体的持续存在；后者在完成安装之后，可以完全不再需要这个外部主体——因为它已经把监控器装进了你的内部语法里。控制社会理论预判的重心落在算法和数据的物质性上，而断根术所指向的，是一种不需算法就能自动运行、不需数据就能逐日强化的自清程序。这一区别有一项可检验的经验推论：在一个单位里，即使领导真心鼓励下属“大胆探索”，即使考核制度在纸面上留出了弹性空间，只要那套“在做事之前先自查这能不能填进格子”的习惯已经内化在个体身上，断根术就仍然在运转。

3.3 异化：最深的共鸣与最致命的预设

在所有既有理论中，与断根术情感上最接近、逻辑上却最需要切割的，是经典异化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异化是指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被剥离了，人变成了自己劳动的陌生者。在韦伯的“铁笼”和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等二十世纪批判理论版本中，异化的内涵被不断扩展，但共享一个底层结构：异化预设着一个可以被异化的“应有的状态”。你本来应该是自由的，但制度让你变得不自由；你本来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人，但体制把你异化成了碎片。你失去的那个东西，在逻辑上先于剥夺它的制度而存在。

断根术所描述的状态则不在这个逻辑里面。被它拦截的，不是在制度运作之前就已经被个体拥有的“本真欲望”或“自由本质”，而是一个从未有机会长出来的东西。一个从大二就开始系统性备考的人，他脑海里的那个“如果不考编我可能做什么”的念头——它从来没有被认真考虑过、从来没有被放在心上的时间窗口里孵育过。它不是“被压抑了”——压抑意味着某个东西在你的内部存在着，被意识的力量按在水面以下，它仍然在你的无意识里活动，它仍然是你的一部分。而被断根术拦住的，是连被压抑的资格都还没来得及获得的东西。它没有生长到足以进入压抑所需要的心理结构的程度。

这个区别不仅仅是概念上的精细。它有直接的经验后果。一个经典的异化状态，会生产出愤怒、反抗、或者至少是某种弥漫的不适感——因为那个“被压抑的自己”仍然在发出信号，仍然在说“我不该是这样”。异化是可被指认的痛苦。断根术完成的拦截，则往往不留下这种信号——因为那个可以发出信号的“自己”根本没有被建立起来。被断根术捕获的人不愤怒，他只是觉得“提不起劲”。他不反抗，他只是真诚地认为“那些做梦的人是不成熟的”。他最大的痛苦是没有内容可以去抱怨——他在所有外部指标上都过得不错，他只是觉得生命中缺了点什么，而他说不清那是什么。经典异化话语够不到这种状态，因为它把解释建立在了一个被剥夺了的先在主体之上——而断根术的暴力，恰在于它把这个先在主体连根掐断了。

3.4 本土制度研究：断根术为什么锚定在编制系统

第四节必须面对的是一部在中国学术史上已经深耕数十年的文献体系：单位制研究与干部考核制度研究。如果这些本土研究已经用它们的术语说清楚了断根术想说的东西，那么“编制系统独有机制”这个论断就是站不住的——它不过是给既有研究成果换了一个更抓眼球的说法。

单位制研究从1980年代至今积累了大量的制度分析与实证调查。这条路径的核心洞见是：中国的“单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组织，而是一种将经济生产、政治控制与社会保障融为一体、对其成员实行“全面管理”的制度形态。李汉林提出的“组织性依附”概念精确地描述了单位成员在资源、地位和身份上对单位的全面依赖。从断根术的视角看过来，单位制的“组织性依附”是断根术得以运转的深层制度前提——正是因为单位管着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考核表格的语法才能够渗透进个体选择的每一个领域。但单位制研究的分析重心始终落在依附的结构特征及其在市场化改革中的演变上，它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个体为什么离不开单位”，而不是“个体在单位里待久了，他‘想离开’的念头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

干部考核制度研究则更直接地触及了断根术的制度肌理。从荣敬本等人提出的“压力型体制”到近年关于基层干部“问责疲态”的实证研究，这条路径详细揭示了量化考核与一票否决制如何在各级

地方政府制造“层层加码”与“避责”行为——基层干部在问责压力下倾向于选择“不出事”而非“干成事”，倾向于规避风险而非主动创新。这条路径已经非常接近断根术描述的现象：考核制度在改变人的行为。但它分析的重心落在考核对“组织绩效”和“干部职业行为”的影响上——“避责”是一个行为层面的现象，描述的是干部在面对考核时选择了什么、回避了什么。断根术的分析重心则落在更远一步的地方：当“避责”从一种策略性的行为选择——你知道某个行为有风险所以你选择不做——演变成为一种认知习惯，即你在还没意识到某个行为“可能有风险”之前，就已经自动地、无意识地将某些类型的念头排除在可思考的范围之外，那么被拦截的就不是“行为”，而是“念头”。干部考核制度研究揭示了“避责行为”的发生机制，但断根术追问的是：这套避责机制在长年运转之后，个体是否仍在“做选择”？还是说，那个做选择的主体的构成方式本身已经被这套机制重塑了——他不再是在两个选项之间做选择的人，他在站到选择面前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有一些选项永远不在他视野里出现的人了。

断根术之所以锚定在编制系统而非泛指一切组织，其制度根据正在于单位制的“全面依赖”与考核制的“全面自清”这两套制度逻辑的合流——而这一合流在其他类型的组织中是不完全成立的。市场组织中的KPI压力确实也会遏制员工的创新冲动，但有三重缓冲是它不具备的。第一重缓冲是退出选项：一个被KPI压得喘不过气的员工可以换一家公司、换一个行业，甚至自己创业——退出本身虽然困难，但它作为一个概念上的可选项，保留在个体的认知视野里，使得“我做这份工作”始终是一个从多个可选项中选出来的状态。编制系统则以制度性壁垒（服务期、编制锁定、社保断缴的全部代价、沉没的备考投入）大幅收窄了退出通道，“我没有别的退路”不仅是情感上的感受，更是一种被制度坐实的结构位置。第二重缓冲是绩效的弹性可量化空间：市场组织的KPI可以随业务变化而调整，一个项目如果证明有潜力，企业可以重订考核指标；编制系统的考核表格分类由上级统一设计，基层单位无权增删项目，表格更新远远滞后于工作内容的实际变化——因此“不在格子内”的事情，无法通过向上争取改变格子的方式来获得承认。第三重缓冲——也是最关键的——是“被看见”的语法本身：在市场组织中，一项工作在年终被“看见”的语法是多样的——可以是一份PPT、一封客户感谢信、一次在全公司面前的汇报，只要你能说清楚你做了什么；而在编制系统中，被“看见”只能通过表格的格子，而被表格语法排斥的事情，你连说清楚自己做了什么的机会都没有，因为那个场合——述职会、考核面谈——本身就是以表格为议程的。

这三种缓冲——退出选项的差异、指标弹性的差异、被看见语法的差异——构成了断根术锚定在编制系统而非扩散到一切组织的制度硬边界。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组织中没有类似的现象，而是说市场组织中的类似现象可以由治理术、规训权力或控制社会理论来充分解释——它们不需要一个新概念。断根术之所以作为一个新概念是必要的，恰是因为在编制系统的特定制度语法下，拦截发生得更靠前、门槛更低、对“尚未成形之物”的杀伤更系统化，以至于既有理论的工具箱已经在边角处理上捉襟见肘。

四、一个跟踪性个案：被表格拦下的五年——以及概念没能完全消化的那个细节

前三章分别完成了问题重判、制度发生史追溯与理论不可还原性论证，至此断根术的概念骨架已经立稳。但从本章开始，本文引入一个跟踪性个案。这个个案在此扮演的是一个双重角色：在大部分

篇幅中，它是断根术从制度语法到个体认知内化的全程经验展示——它让前三章的抽象论证在具体的时刻、具体的表格、具体的对话中获得可感知的纹理。但在本章的末尾，它将主动呈现一个断根术“解释得勉强”的细节，这个细节不作为例外被立刻消解，而是被保留为概念当前盲区的种子。

以下个案来自一名基层公务员五年的职业经历。此人入职于一所中部省份的区级机关单位，本科毕业于一所211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父母均为普通职工，没有体制内背景。个案材料基于半结构性访谈的三次录音（分别在入职第一年、第三年、第五年）及该单位公开的年度考核文件整理，受访者已匿名化处理，细节做了去识别化改动。本文选择此个案而非虚构典型化场景的原因在于：只有被具体时刻、具体表格、具体对话锚定的经验叙事，才能展示断根术如何在个体的每一个选择关头被“这个填不进格子”这道门槛反复触发，而不是被当作一个已经从结构中抽象完的必然结论。

4.1 入职第一个月：“填格子”作为入职教育

他称在入职培训中，关于年度考核表的讲解只占了四十五分钟。主讲人是人事科的一位中年女干部，讲的语调平淡，像是在读一份操作说明。但他在那四十五分钟里记住了一句话，此后五年这句话反复在他的脑子里出现。那句话是在讲解表格“主要工作业绩”一栏时说的：“有些新同志可能会问，我这一年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表格格子就这几个，怎么填？我要提醒大家，不是所有你做的事都能往上填的。填得进去的才叫业绩。填不进去的，你做得再多，在组织这里是不存在的。”

他对这句话的最初反应不是恐惧或反感，而是觉得“这个大姐说话实在”。他回忆说，当时心里甚至有一丝“学到了”的感觉——觉得这是体制内前辈在传授实战经验，能让自己少走弯路。

从发生学的角度，这个时刻的重要性不在他是否“被吓到了”，而在于他此后每次站在一个选择面前时，脑子里自动浮现的审查语法，就是以这句话为模板的。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模板的安装——他没有做任何决定说“从今以后我要按这句话的原则行事”。他只是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每次想要做一件事——比如主动联系其他科室讨论一个跨部门的业务流程优化——都会在伸手拿电话之前，脑海里自动过一遍：“这个事年底能填进哪个格子？填不进的话，组织那里是不存在的。”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会在心里回答自己“确实填不进”，然后放下电话。

这个过程值得被仔细拆解，因为它正是断根术从制度进入个体心理操作的那道关键接口——那个链接制度端与心理端的闭环的第一个扣。制度本身——那张表格——并没有拦他。表格不是在他拿起电话的那一刻飞过来把他手按住的。拦他的是他已经内化的那套审查程序。而这个程序的内化，不需要反复的训斥、不需要恐惧的累积、甚至不需要任何外部惩罚——它只需要一次“实在的前辈传授”，加上几个月里几次自己做出的“理性的自我止损”，就完成了安装。一旦安装完成，这个人此后每一次放弃尝试的经历，都会反过来加固他对这句话的认同——“大姐说得对，果然那些事填不去”。断根术的第一个扣，就此合上。

4.2 入职第三年：第一次“不存在的半年”与其后续代价

入职第三年，他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了一项可以优化的审批流程。当时他所在的科室负责一项面向企业的审核业务，审核周期通常在十五个工作日左右。他注意到，审核材料中有几项是多个科室重复收取的，如果能建立一个跨科室的数据共享机制，审核周期有可能缩短到五个工作日。他向科长提出了这个想法，科长说“你去试试”。

他用半年时间联系了三个相关科室，开了两次协调会，设计了初步的数据共享表格，甚至在信息中心协助下做了一个小范围测试。测试的结果是正面的——至少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跨科室协调在推进到第四个月时陷入僵局：一个兄弟科室以“数据安全需要评估”为由暂缓参与，而评估需要上级审批，审批流程又在另一个系统里排期。

年底填考核表时，他发现这半年的工作无法填入表里的任何一栏。他可以填的是：常规审核业务量（按部就班地完成）、参加了几次会议、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他把协调过程中整理的资料勉强写成了一份“报告”，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以报告为目标的）。那半年真正的核心工作——协调、测试、推动一个跨部门流程改革——在表格上没有对应的格子。他最终选择了在“其他”栏里写了一句“参与了流程优化前期协调工作”。这句被量化评价时得分为零，因为它没有对应的数字。

几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时，他对我说了一句话，语气很轻，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那半年在表上是不存在的。”

现在可以回到第二章末尾留下的那个论证任务：这“不存在”的实际代价是什么？在这个个案中，代价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发生了。第一个层面直接可见：年底考核排名。那一年，他所在科室的三个人中，他排最后。排第一的同事全年做的工作是常规审核业务量翻倍——一项安全、可量化、全程在表格格子内的工作。他没有不满——他承认按表格的统计，那位同事“做得多”。但他也隐约知道，如果加上那半年没填进去的投入，两人做的总量或许不相上下。表格使得这个“或许”永远无法被提出。

第二个层面在考核之后慢慢浮现。次年春天一次单位中层会议上，分管领导在总结去年工作时提了一句：“有些年轻同志，热情是有的，但要学会抓重点。”他没有被点名。但整个科室只有他一个年轻同志。这句话的威力不在于它是批评——它听起来甚至像一句善意的职业建议——而在于它不可回应。你不能站起来说“领导，我其实有重点，只是重点没填进格子”——因为这句话本身就承认了“没填进格子”，而“没填进格子”在组织的语法里就是“没抓住重点”的同义词。

第三个层面最难以被察觉，但恰恰是这三个层面中与断根术最相关的。在第三年之后的两年里，他又有过两三次类似的“较小的尝试”——推动某项业务培训改革、提议建立科室间的轮岗机制——每一次都在初期热情投入几周至一两个月之后，在某个节点被搁置，然后不了了之。到第五年访谈时，他回忆这些尝试时用的句式已经变了。第三年回忆“那不存在的半年”时，他还带着一种遗憾和不甘的语气——那说明那个时候他仍然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是有价值的，只是系统不承认。第五年回忆起后面那两三次“不了了之”的尝试时，他的语气变成了：“那时候还是年轻，想得太简单了。”他在说的，已经不只是“系统不承认”，而是“我当初不应该那么想”。

断根术在此刻的运转，不是在动手之前就拦住了他，也不是在事后用表格的沉默告诉他“不算数”。它完成了一件更彻底的事：让他自己变成了那个事后替表格去批评当初那个“年轻、想得太简单”的自己人。这是断根术闭环合上的决定性一步：表格不需要再出面了——他自己会替他当初的每一个生成冲动补上一刀否定，而这一刀是以“我终于成熟了”的面目出现的。

4.3 入职第五年：他已经不需要表格了

第五年的访谈是在他入职满五年之后的那个月做的。我问他最近有没有什么“想做但还没做”的事。他想了很久，说：“好像没有。”然后他自己补充了一句：“也不是说我不想做事。就是现在做

什么事之前，我脑子里先把账算完了。赚的做，不赚的算了。以前会觉得有些事虽然不赚，但挺有意思的，现在好像连‘有意思’是什么感觉都想不起来了。”

这段自我描述几乎是在用自己的话重新说了一遍“断根术完成了从拦截生成式投入（中层）到侵蚀生成能力（元层）的全程”。但更值得注意的不是他的自我诊断的精确性——精确反而可能是他已经在访谈中学会了我的词汇。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无意间说出的“现在好像连‘有意思’是什么感觉都想不起来了”这句话里的那个“想不起来”。这不是修辞。当一个被断根术充分捕获的人说“我想不起来有意思是什么感觉”时，他是在描述一种真实发生的认知退化：他曾经是有过那种感觉的——在第一年访谈时他还提到“有些培训挺有意思的”——但那感觉在五年里从未被表格承认、从未被任何组织反馈验证、从未在任何一次年终结算中被正面标记。它在他的人生里是一组从未得到强化的神经连接，而在漫长的未被强化中，它自己消退了。

4.4 一个概念没能完全消化的细节

在整理此个案时，笔者需要诚实地标出一处断根术的理论框架解释起来“勉强”的细节。这个细节出现在第二年的访谈中，当时他讲述了如下一件事。

入职第二年，在一次单位组织的户外团队建设活动结束后，他和三个年龄相仿的同事一起走回停车场。其中一个同事——平时在工作中以“按部就班、从不主动揽事”著称——忽然说起他周末自己在家做了一个木工小项目，给女儿做了一个玩具收纳架，讲的时候整个人神情都变得不一样了：“那个东西，从画图到打磨，每一步都是我自己的，做错了重做也没人有意见。”另一个同事接话说自己也有一项类似的兴趣——业余做皮具。第三个人说自己是周末骑车爬山，不约人，一个人骑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再骑回来。被访者告诉我说，他当时心里有一个念头，但没说出来。那个念头是：“你们怎么在工作以外还有这些东西？”

这个细节的“勉强”之处在于：他的三位同事，同处一个编制系统，同样承受着表格语法和一票否决的辐射压力，却仍然在业余时间里保留着生成式投入——做木工、做皮具、骑车探路。这些投入具有典型的生成特征：在开始之前无法预见具体成果（木工做坏了就得重做），过程本身是开放的、不依赖外部认可的，且没有经济回报。如果断根术如本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长年运转中系统性地拦截生成状态，那么为什么这三个人的生成状态没有被拦在业余时间？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本文第五章第三节将要讨论的“早年锚点与偶然保护因素”——这三个人可能在进入编制系统之前，就已经建立了某些不被考核语法覆盖的生成习惯。但被访者在访谈中没有提供这三人的早年背景信息，因此这个解释在此处只能作为一种未经检验的假说存在，不能被当作“问题已解决”。

笔者将这一细节保留在此，不试图在本章或本章之后立刻消解它。它提示的是断根术当前理论框架的一个边界：本文的论证重心落在编制系统如何通过考核表格语法和一票否决辐射效应在工作场域内拦截生成状态，并论证了当工作场域占据了人生的绝大部分清醒时间之后，这种拦截会外溢到个体的整体生命姿态。但业余时间的“飞地效应”——即即使在同一个编制系统内，某些个体的业余时间仍然能够维持生成式投入——的发生条件、持续条件和衰减条件，本文的理论框架目前未能给出充分解释。这个问题将在第八章作为断根术未来研究的一个开放方向被再次提出。

五、上游的延伸：高考志愿与被提前封锁的生命形态

第四章的个案展示了断根术在编制系统内部的完成形态。但断根术并不等到一个人考入编制之后才开始运转。在高考志愿填报这个时间节点上，断根术就已经通过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共谋，对个体生命中最早期的那批生成冲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预先拦截。本章分析的不是编制系统内部的运作，而是系统如何向上游延伸，把“止损”的认知习惯植入个体进入系统之前的生命阶段。

5.1 志愿填报现场的拦截触发

当一个十七岁的学生坐在电脑前，面对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在“生态学”和“会计学”之间犹豫时，他正在经历的不仅仅是两个专业之间的选择。他正在经历的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面对一个制度性逼迫：你必须在几天之内、在信息极度不对称的条件下，把你的未来兴趣——那些此刻还模糊不清、连你自己都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兑换成一份可被计算的就业前景数据，然后据此做出不可更改的决定。

那个对生物的模糊兴趣，此刻在学生的脑子里是什么形态？它不是一个职业规划——他根本说不清学生的将来能做什么。它甚至不是一个可以被称作“热爱”的东西——他只是在生物课上觉得观察植物细胞分裂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只是在书上读到某个生物学家在热带雨林里待了十年的故事时兴奋了一下午。这是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在接下来的四五年里，如果被大学的课程、被导师的引导、被同伴的讨论所反复浇灌，可能长出一个成熟的研究方向，也可能长出一个与生物无关但被那四年的探索精神所催生出的别的什么东西。它的结局是不确定的——正因不确定，它才可能长成某种真正的生命形态，而非一份被提前写好条款的产品说明书。

断根术在志愿填报现场所做的，不是禁止任何人填“生态学”。它只是通过一套弥漫性的成本收益话语——这套话语通过家长、老师、媒体、以及学生自己已经内化的那套计算逻辑——在每一个年轻人面对那粒种子时，替他们抢先做了一次止损。

5.2 “负责”一词是怎样被制度语法改写的

在这套止损话语中，最不容置疑、也因此最有效的词是“负责”。“你得为自己的将来负责”——这句话在志愿填报现场的频率和杀伤力，超过任何直接的禁令。而对“负责”一词的分析，本文在此选择不走“它本来的含义是……后来被变质为……”的本质回归式的解释套路。那个套路会预定义一个“负责”的真实含义，然后把现实的用法判定为对这个真义的偏离。发生学的做法是不同的：追踪“负责=确保在开始之前不出错”这个等式，是在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经什么样的差异推进，被一步步生产出来的。

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社会中日常使用的“负责”一词，其核心语义更接近“自己做的事自己扛”——包含了对失败后果的承担。一个农民种了一块试验田没收成，他说“我自己负责”，意思是他愿意承受收成不好的后果。这个时候的“负责”并不包含“必须提前证明此事绝不出错”的意思——它恰恰承认了事情有可能出错，而出错的后果由我承担。

变化发生在两个制度进程的交汇处。第一个进程，是企事业单位内部考核体系的量化改革（本文第二章已详述）。“负责”在考核语法中从一个动作性概念（“这件事由谁负责”）变成了一个可审

计的追溯性概念（“出了这件事要由谁负责”），而后者的实际操作在科层体制中逐步演化为：如果一个岗位在年初签了“责任书”，年底出了差错，责任人就要被追责——而不论差错是否由责任人可控的因素导致。在追责不可抗辩、而免责条件又极其狭窄的制度现实中，一个理性的责任人唯一能够自保的方式，就是把“负责”的定义前移——从“出了事我承担”变成“在出事之前，我确保不会出事”。

第二个进程，是这套被前移了的“负责”逻辑在教育场域中的扩散。1990年代末开始，随着高等教育扩招与就业市场化的双重压力，家庭对子女教育的决策日益从“帮你成长”转向“帮你避险”。“为你的未来负责”这七个字在家庭教育现场的日常使用频率急剧上升。而在说出这七个字的时候，家长援引的不再是那个老的、包含了对失败后果的承担的“负责”，而是那个被考核语法改写过的、等同于“确保在开始之前不出错”的“负责”。

当一个母亲对女儿说“学这个不好找工作，你要为自己的将来负责”时，她不是在要求女儿承担选择的后果——她的语调里没有“就算选错了妈妈也支持你”的成分。她是在要求女儿在做出选择的这一刻，就已经提前把那条路上所有可能的坑都排除干净。而她之所以能理直气壮地这么要求——并且觉得自己是在行使一个母亲最正当的职责——是因为在她的工作单位里，“负责”这个词已经被她的年度考核表训练了二十年，训练成了“确保不出错”的同义词。断根术从制度进入家庭，不是通过任何直接的力量。它是通过一个词在日常使用中的语义漂移，完成了从组织考核语法到家庭教育语法的跨界搬运。而那个坐在志愿填报系统前的十七岁学生，他对那个叫“负责”的词的全部理解，已经是被搬运之后的、已经变质的那一个。

5.3 中断的自治：那些偶然穿过网眼的人

在上述分析之后，本文必须自己提出一个可能削弱论点的问题：如果断根术真的如此高效，为什么在编制系统内部和更广泛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保持着强劲内在驱动力、持续做着那些“不确定结果”的事情的人？他们的存在不是对断根术的证伪吗？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个案中出现过的那个关键变量——科长的“你去试试”。在本文个案的第三节中，受访者在入职第三年做出了那半年“不存在的”流程优化探索，是因为他在启动时得到了科长的口头支持。把这一点放大来看：那些在断根术全面铺开的环境里仍然保持着内在驱动力的人，几乎都能在自己的经历中找到某个结构性的保护因素——一位在学生时代鼓励过他们“做你觉得真正重要的事”的老师、一段在进入体制之前在相对宽松的窗口期度过的大学时光、一个在家庭中享有某种豁免权的特殊位置（比如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被寄予的期待较轻）。这些因素有一个共性：它们都在断根术全面起效之前，提前为这个人建立了一个参照点——一个在断根术的逻辑之外、先于断根术而存在的、让他能够在后来遭遇止损自问时识别出“这是系统在要求我放弃”的锚。第四章末尾那个关于三位同事的“勉强细节”提示的，可能正是这类早年锚点在业余时间中的延续效应——但正如第四章所坦承的，这个解释目前只是假说。

他们没有完全被断根术捕获，不是因为他们在意志上比其他人更强韧，而是因为断根术的网在他们的生命早年，恰好有某个破洞——一个没有被“负责=确保不出错”的语义搬运覆盖到的地方。而大多数在高考志愿阶段就被全面拦截的年轻人，他们身上没有这个破洞。他们的家庭、学校、媒体环境在断根术的语义搬运这件事上配合得太好，在每一个关键的节点上——选科、分文理、填志愿——都用“为你好”的合法句式，把那些还没机会说出自己名字的生成冲动提前清算掉了。

六、断根之后的两种体验：从日常磨损到终端空洞

断根术在长年运转之后，在个体身上留下的不是整齐划一的后果，而是两种在现象上不同、在发生上有承接关系的体验。第一种是“无聊”——它出现在断根术持续运转的过程中，是个体在日常工作中日复一日地遭受生成式投入被拦截时积累起来的磨损效应。第二种是“空虚”——它出现在断根术基本完成之后，是个体在获得了止损策略许诺给他的全部东西（稳定、安全、体面）之后，在那套“全部”的内部发现的一种没有内容的空洞感。

本章不是把这两种状态当作两种独立的“人格类型”去分类，而是把它们当作断根术在流程的不同阶段产生的不同效果来追问：无聊是如何被系统推着完成向空虚的过渡的？什么制度变量控制着这个过渡的节奏？

6.1 无聊的发生条件与制度参数

回到个案。被访者在入职的前三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无聊感。那些年他的工作是饱和的、有新鲜感的，而且他至少有一次“那半年”的尝试——尽管以失败告终。他的无聊感在第三年到第五年之间显著上升。原因不是工作本身变了，而是他的探索输出的失败累积达到了一个临界值：在经历了第一次流程优化的“不存在”之后，他又经历了两三次类似的较小规模尝试，结果都是同样的——在考核表格上无法被记录，在领导那里得到一句“想法不错但先放一放”。到第五年访谈时，他说“好像现在做什么事之前，我脑子里先把账算完了”，这表明他已经从偶尔遭遇拦截，进入了稳定执行自清的状态。而无聊——那种“我每天做了很多事但记不起自己做了什么”的体验——正是这个稳定执行自清状态下的日常感受。它的心理内容不是“痛苦”，而是“无感”：每天的工作在发生，但每件工作在发生的当下，他已经在脑子里用表格语法把它消过一遍毒了，没有一件事能在他心里留下任何“这是我做的”的痕迹。无聊，就是消毒之后留下的那片无声的日常。

由此可以归纳出两个控制无聊发生强度的制度参数。第一个参数是探索输出的失败累积次数。一个新人在一开始仍然会把冲动转化为尝试，但每次尝试如果在表格反馈中被判为零，就会在情绪记忆中增加一笔“那次什么都不是”。当累积次数超过个体的某个阈值，“再去尝试”这个行为就从默认选项变成了需要额外心理努力才能启动的选项。无聊就发生在默认选项关闭之后、新的意义来源尚未建立之前的那段日常运转中。第二个参数是岗位的重复性强度。有些编制岗位本身就具有高度重复性——窗口服务、材料审核、数据录入——在这种岗位上，即使个体从未有过单次显著的探索失败，单是日常工作的形式本身就足以通过单调重复产生类似无聊的效果。本文不将这种意义上的无聊归入断根术的独有效果，因为它可以被任何关于重复性劳动的理论充分解释。断根术所独有解释力的，是发生在那些原本具有创新潜力、但因考核表格语法的拦截而最终被拖入无聊循环的岗位上的无聊——被访者的岗位恰属此类。

6.2 从无聊到空虚：一个被个案标记的过渡轨迹

空虚与无聊的不同之处在于：无聊的人还在系统里——他觉得日子没意思，但他仍然每天在上班、填表、下班。空虚的人已经不再需要表格拦他了，因为那些会被表格拦住的东西，已经不再向他走来。

被访者的无聊在第三年之后逐年加重，但真正向空虚的质变，是在第五年他无意间说出那句“好像连‘有意思’是什么感觉都想不起来了”时被标记出来的。这不是一个突然的转折，而是一个渐进消音过程走到尽头的自然终点。一个人生命中那些曾经有过的模糊冲动——那个下午想翻一本闲书的念头、那个深夜里觉得“这不该是全部”的空落感——这些冲动在被反复止损之后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没有被给予足够的注意和时间去长成可以进入意识的形态，所以它们不是在意识层面被否定，而是在进入意识之前被消音。久而久之，这个人的意识世界里就只剩下那些可以被表格承认的、已经被制度定义为“有用”的东西——工作业绩、收入水平、社会地位。这些东西是真实的，但它们在意识中独存而没有那些被消音的冲动作为背景陪衬时，就呈现为一种奇特的空洞感：有所有“应该”有的东西，却没有“我”在这些东西之中。

从无聊到空虚的过渡，本质就是那个背景陪衬——那些在早期仍然偶尔浮上水面、发出微弱信号的被消音的冲动——从偶尔浮现到彻底静默的过程。被访者在第三年回忆“那不存在的半年”时，他还能感觉到遗憾，那是那个被消音的冲动最后一次发出能被他自己听见的声音。第五年那句“想不起来”，是那个声音彻底静默之后的回望。这份账单不是一份被遗忘的存折，去回忆它、找回它，已不是同一个东西。

6.3 什么变量决定了“停在无聊”还是“进入空虚”？

从无聊到空虚的过渡不是自动的、等速的。本文从个案和更大范围的观察中，识别出三个使个体“从无聊滑入空虚”的加速条件：

时间长度。无聊是断根术在日常运转中的持续磨损，空虚是磨损充分完成之后的终端形态。一个入职三五年的年轻人可能仍然在无聊中挣扎——他还能感到无聊本身就是证明，说明他仍然在期待某种不一样的东西，无聊是对那个期待的持续挫败。而一个入职十五年的人，如果他的生成状态从未得到过任何外部验证，那么他对“有意思”的感觉可能已经不可访问了——他不是无聊，他是对无聊已经不感到痛苦了。

岗位的象征性负荷。如果一个人从事的工作被社会广泛赋予“重要”“有使命感”的象征意义（如医生、教师、法官），那么他可以在更长时间里用这种象征意义来对抗无聊——即使日常工作同样被表格语法掏空，“我是教师”这个身份本身仍然提供了一种超越表格的意义来源。但如果一个人从事的是高度行政化、社会象征负荷较低的岗位，那么当他日常工作的意义被表格掏空之后，就没有额外的象征资源可以填补。这解释了为什么在编制系统内部，不同岗位之间的无聊-空虚过渡速度存在显著差异。

家庭缓冲厚度。如果一个人的家庭为他提供了表格语法之外的验证源——比如伴侣认可他“在家里是个有趣的人”、父母不把他们的期待全部耦合在“你升到什么级别”上——那么他仍然可以在工作中执行止损策略的同时，在家庭内部保留一小块生成状态的飞地。这一块飞地本身不能阻止无聊的发生，但它可以显著减缓无聊向空虚过渡的速度，因为它持续地为个体提供一个表格之外的、仍然能识别“有意思”的参照点。空虚大规模爆发的位置，恰是那些连家庭也无法提供缓冲的人——他们在家里的对话也是“今年考核怎么样”“什么时候提副科”，而没有人问“你最近有没有做什么有意思的事”。这一点也间接回应了第四章末尾那个尚未消化的细节：那三位在业余时间保留着生成式投入的同事，他们的家庭可能在发挥着这个缓冲功能——但这仍然只是一种假说。

七、反驳与边界：断根术不能被用来解释什么

一个概念的理论边界，不仅在于它能解释什么，更在于它坦承自己不能解释什么。本章处理四种对断根术最可能提出的反驳，并在逐一回应的过程中，明确勾出概念的硬边界。

反驳一：“这不就是‘异化’换了个名字？”

这个反驳在本文第三章第三节已经与异化理论做了概念层面的切割。这里需要补充一个直接的回应：如果批评者坚持认为“断根术可以被归入异化”，那么他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操作——把本文个案中受访者第五年的那句话放进异化理论里分析，看他能分析出什么。“好像连‘有意思’是什么感觉都想不起来了”——这是一个被异化者的表述吗？经典的异化分析会指出：他失去了与自己类本质的联结。但“类本质”是一个预设——它声称这个人本来应该拥有一种叫“自由自觉的劳动”的东西，而制度剥夺了它。但如果这个人从大二开始就在系统性备考、从未有过任何机会去形成所谓“自由自觉的劳动”的经验，那么被剥夺的东西在哪里呢？异化理论说“被剥夺了”，而本文说“从未被给予过生长的机会”。这两个判断指向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形态：前者仍然有一个“本来面目”作为参照，愤怒或悲哀由此而来；后者则连这个参照都找不到，留下的是无从说起的不安。如果批评者无法在异化框架里找到“从未被给予生长机会”这层东西的对应位置，那断根术就仍然站在异化的射程之外。

反驳二：“把结构性生存压力归因于一套‘术’，是不是太轻飘飘了？”

这个反驳在本文第一章与第二章已经做了初步回应。这里只补充一件事。本文指的“断根术”是一种系统性的、制度层面生产出来的拦截机制，不是指个体的某种心理习惯或认知偏误。它将个体的理性避险行为视为起点，但不将其视为终点——它追问的是，那些避险行为在长年累月中被什么制度语法组织起来，最终形成了怎样的结构性效果。断根术并不否定一个人在特定条件下的理性，而是指出：个体在每一个节点上做出的理性选择——不碰那个填不进格子的事、不冒那个一票否决的风险——其加总效果是一套与每个行动者的初始意图无关的拦截系统的形成和持续运转。批评个体“被断根术捕获”，不等于批评他当初选的错，而是指出这个系统有一种超出个体意图的反身效应：你越是理性地在这个系统里自保，你就越是参与巩固了那个慢慢让你失去某种能力的模具。

反驳三：“大量编制人员保持着丰富的非核算性生活——这不就证伪了断根术吗？”

这个反驳在本文第五章第三节已经回应过。此处补充一层统计学注释。断根术在本文中被界定为一张滤网，而不是一把狙击枪。滤网并不要求网住每一条鱼，它的效力体现在长期、大面积运转下，使得特定类型的生成状态在统计上显著被抑落。那些保持丰富非核算性生活的人，要么是在网收紧之前就已经长出了足够深的地下茎（早年锚点），要么是在网的某个局部破洞中恰好存身（某个鼓励探索的领导、某个岗位的例外弹性）。他们的存在不削弱断根术的理论硬度，反而以“需要被特殊条件解释的例外”的形式，从反方向勾出了那张网的正常覆盖范围。第四章末尾保留的那个“同事业余时间做木工”的细节，正是这类例外的一个样本——它没有被消解，正是为了让例外继续作为例外被看见，而不是被强行塞进理论的解释里。

反驳四：“民营企业里难道不也一样？KPI下谁敢乱来？断根术凭什么只属于编制系统？”

这是一个有力的反驳，其攻击方向是断根术是否具有制度独特性。如果同样的拦截机制在一切组织中都存在，那么“编制定位”本身就是一个被错配的解释变量。

本文在第三章第四节已经从制度语法层面给出了系统性的回应：市场组织中的KPI止损与编制系统中的考核表格止损存在三重结构性差异——退出选项的差异（市场：可退出；编制：制度性壁垒锁定）、指标弹性的差异（市场：可随业务调整；编制：上级统一设计、基层无权增删）、被看见语法的差异（市场：多种表达方式；编制：只能通过表格格子）。这三重差异构成了断根术锚定在编制系统而非扩散到一切组织的制度硬边界。

在此，以第四章个案中的那个“跨科室流程优化”尝试做一个具体的对照，让这个制度边界在经验上可感知。试想同一个人、同一项提议——跨科室数据共享以缩短审核周期——如果发生在一家市场化运营的物流公司。他提出方案后，推动过程可能同样遭遇阻力（兄弟部门不配合），年底KPI考核时他的投入可能同样难以在现有指标中被充分反映（因为流程优化不是他原定的核心KPI）。但关键的差别会在以下三个节点上依次出现。第一个节点是被看见的方式：在年终述职时，他仍然可以做一份PPT，用流程图、前后对比数据（即使只是测试数据）和客户反馈来向管理层展示这半年的工作——这些展示材料不需要提前被某一套固定的分类体系承认，他可以自己创造展示的框架。第二个节点是退出：如果这家公司连续两年不承认这类投入的价值，他可以跳槽到另一家更看重流程创新能力的公司——他的能力（推动跨部门协作、设计新流程）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可被定价的。第三个节点——最关键——是下一轮念头的命运：当他在新公司又一次产生一个类似的优化念头时，他上一次那半年的经验没有被翻译为“那半年在组织那里不存在”，而是被翻译为“那次我们推动得不够成功，具体在A环节和B环节上遇到了阻力”——这个翻译保留了经验的可解释性、可学习性，因此也保留了投入者本人的行动者身份。被访者那“半年在表格上的不存在”，与这个物流公司员工在述职PPT中即使没有得到奖金但至少“这个东西被看见了”之间，差的不是结果，而是在结果的生成过程中，个体是否被允许保留为自己的投入赋予意义的能力。断根术所拦截的，正是这种能力。它并不宣称“只有编制系统里才存在对生成状态的拦截”，而是宣称：在编制系统特有的考核语法下，这种拦截发生得更靠前、门槛更低、对“尚未成形之物”的杀伤更系统化，且对个体的反身效应（使你变成那个替系统去否定自己的人）是既有理论工具箱未能充分辨识的。

八、结论：无法被填进任何表格的生命账单

编制崇拜是一场同时发生在制度与身体两个层面上的秩序工程。本文从差异维起手，追溯了编制系统在三十年制度变革中，由量化考核表格、一票否决制及其辐射效应逼出来的那套将“不确定性”转变为弥漫性合规压力的命令，并论证了这套命令最要害的运转机制不在于压抑已成形的创造力，而在于持续拦截那些尚未成形、无法在表格格子里被证明“合规”的生成状态。本文将这一机制命名为“断根术”。

理论贡献。断根术在数个最接近的既有理论工具箱之间，切开了一个被共同忽略的辨别维度——制度语法内化为心理习惯之后所形成的那个闭环反馈。它不是规训——规训的靶心是已做出的行为；它不是治理术——治理术的止损发生在量化之后，而断根术的止损发生在个体还没来得及把一件事量化为“可计算的选项”之前；它不是控制社会——控制社会靠数据追踪来预判，而断根术靠的是让个体在每一个选择前自行启动那套“这能填进哪个格子”的自查程序，在安装完成后不再依赖外部监控

主体；它甚至也不是异化——异化预设了已然被拥有的本真状态，而断根术拦截的，恰是那本真状态得以形成之前的那段混沌期。在与本土单位制研究与干部考核制度研究的对话中，本文论证了断根术之所以锚定在编制系统而非扩散到一切组织，其制度根据在于单位制的“全面依赖”与考核制的“全面自清”这两套制度逻辑的合流——以及在退出选项、指标弹性和被看见语法上的三重结构性差异——是其他组织类型不完全具备的。它在这个辨别维度上的不可还原性，以及它与本土制度研究传统的实质性对话，是本文对所涉理论传统的主要贡献。

理论边界。断根术解释的是系统压力如何被结构性地生产出来，以及这股压力如何通过表格语法的反馈循环，在长年运转中介入个体生成能力的形成与侵蚀。它不能单独解释为什么某些个体仍然能在同等制度压力下保持生成能力——那需要引入个体生命史中的早年锚点和偶然保护因素，这在本文第五章第三节中已做了交代，而第四章末尾保留的那个“同事业余时间做木工”的细节提示了这一解释路径目前仍然面临的问题：早年锚点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持续为业余时间的生成式投入提供缓冲？断根术目前的框架对此尚未能给出充分回答，这个问题留待后续研究。断根术也不能被滥用来概括一切现代人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它有其特定的制度发生史，只适用于那一套以“在表格上无法自清就等同于真切的排序、声誉与晋升损失”为实际运转逻辑的考核环境中。它更不否认个体最初的考编动机可以完全出于理性的就业考量——它追问的只是，一旦进入那套备考与考核的系统之后，他们除了“准备考试”之外，还被训练了什么。

证伪条件。本文的命题是结构性的、概率性的，而非全称的。它关于“编制系统以考核表格的语法系统性地拦截个体生命中尚未成形的生成状态”这一判断，将在以下趋势性变化成规模出现时被经验所证伪：如果在现行考核制度不发生根本变革的前提下，我们持久地、大量地观察到，体制内从业者在其职业日常中普遍地、不受惩罚地将大量时间投入那些“在开始之前无法清楚预见其结果和收益”的事务，并且这些投入不仅不被视为个人在排序、声誉和晋升上的不利因素，反而被组织承认、被考核表格的语法所接纳为正常工作的一部分并得到正向的量化反馈——那么本文的判断就将被证伪。

如果上述变化没有发生——如果在每一个偏离最短自清路径的尝试面前，个体仍然必须在脑子里先替自己跑完一套“如果这件事在第一年的表格上什么都不是，我排名的损失、领导那句‘不抓重点’的标签、以及明年再想尝试时心里那个‘上次什么都不是’的自我否定，能不能扛住”的审查，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以此为由终止尝试——那么，断根术便仍然在运转。而那些被拦截的生成状态，将继续堆积在无数人的人生里，成为一份他们永远不会填进任何表格、却也无法自己为自己清账的生命账单。

深化增补·全球近邻补切（编辑增补）

说明：以下各节为编辑在审读时增补，不改动作者正文与核心判断，只补上本文原稿未正面处理的最近邻理论与实证研究，并把分离线写成可操作的判别。每一条都给出“若观察到什么，本文即错”的对照预测。

与默顿「官僚人格·仪式主义」的分离线：过度内化，与后果结构的重排

本文原稿把主要对手锁定在治理术、规训与控制社会、风险社会三条线上，处理得相当细。但在组织社会学一侧，还站着一个更早也更贴身的近邻：默顿（Merton, 1940）的《官僚结构与人格》。他的论证是，官僚制通过对规则遵从的持续奖励，使成员把规则本身内化为价值，手段升格为目的，最终产生一种在非常规情境中失灵的仪式主义人格。

分离线在于**机制的着力点**。默顿的机制是**过度内化**——行动者真的相信规则，因此他会为规则辩护，会在规则被质疑时感到人格受到冒犯。本文所描述的断根术，其机制是**后果结构的重排**：行动者**完全不必内化任何价值**，他只需要正确地计算哪些动作会留下可被追责的痕迹、哪些说法在表格里没有格子可填。

这条分离线立刻给出一个可观察的判别：仪式主义者在私下会为规则说话；断根术下的行动者在私下极其清楚规则的荒谬，并且能准确地讲出荒谬在哪里——然后照做。若在实地访谈中发现，回避说不清价值之事的人普遍在私下同样认同该回避是正当的，那么默顿的内化机制已经足够，本文的重排机制多余。

与凡勃伦「训练出来的无能力」的分离线：被挤掉的能力，与没能长出的能力

凡勃伦提出、后经伯克与默顿发展的 trained incapacity（训练出来的无能力），说的正是「越是被专门训练，越在某类情境中失能」。这个概念与本文的距离近到不能不处理。

分离线在于**时间位置**。trained incapacity 描述的是一种**挤占**：行动者曾经有可能发展出多种应对方式，专门化训练使其中一种极度发达而其余萎缩——因此它在原则上可以靠再培训、轮岗、跨界经历部分逆转。本文的断根术描述的是**拦截**：那一类判断在萌芽阶段就没有获得可以生长的处境，行动者并非把它练废了，而是从未拥有过它。

对照预测：给一批长期在指标环境中工作的人提供充分的跨界经历与再培训，若他们在「说不清价值但可能重要」这类事项上的处置能力恢复到指标制度建立之前的水平，则本文错，挤占解释足够；若恢复的只是他们讨论此类问题的词汇量，而实际处置仍然一律走回避，则拦截机制成立。

与胡德「避责」理论的接通：把一票否决的辐射效应变成可采集的量

本文第 2.3 节所描述的一票否决辐射效应——从不碰红线，到不碰红线外围的整片灰色地带——在公共行政研究里有一个成熟的对应物：胡德（Hood, 2011）的避责理论。他系统地论证了公共部门官员如何通过改变工作的组织方式、记录方式与责任分配方式来预先规避可能的追责，并把这类行为称作防御性的机构设计。

把这条接上来，本文的核心现象就获得了可采集的指标：在会议记录与请示文件中，**说不清价值的事项被主动搁置或转为他人职责的比率**；同一事项在一票否决条款出台前后的处置方式差异；以及这一比率与该单位近三年被追责事件数的相关。这些数据在多数机关的档案里是现成的。

接通之后也要划界：避责理论解释的是**个体的理性规避**，它默认官员知道什么是好的、只是不敢做；本文往前推一步——当规避持续三十年、成为一代人的全部职业经验之后，「什么是好的」这个判断本身失去了被生成的场所。避责是本文的机制，不是本文的结论。

本次增补所核验的文献

- Hood, C. (2011). *The Blame Game: Spin, Bureaucracy, and Self-Preservation in Govern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erton, R. K. (1940).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Social Forces*, 18(4), 560–568.
- Veblen, T. (1914).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 Macmillan.

参考文献

- Beck, Ulrich (1986)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Brown, Wendy (2015) *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 New York: Zone Books.
- Deleuze, Gilles (1990) "Post-scriptum sur les sociétés de contrôle," *L'Autre journal*, n°1, mai 1990. English translation in *Negoti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Foucault, Michel (1975)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Paris: Gallimard.
- Foucault, Michel (2004)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Paris: Gallimard/Seuil.
-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offman, Erving (1961)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Anchor Books.
- Kahneman, Daniel & Tversky, Amos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2): 263-291.
- Lazzarato, Maurizio (2012) *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 An Essay on the Neoliberal Condition*. Los Angeles: Semiotext(e).
- Marcuse, Herbert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 Marx, Karl (1844/1932)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MEGA I/3. Berli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 Weber, Max (1905)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Bände XX und XXI.
- 李汉林 (2004) 《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路路、李汉林 (2000) 《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荣敬本等 (1998) 《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路风 (1989) “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